

生活与命运

(上)

[苏联] B. C. 格罗斯曼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译者序

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被苏联国内和西方誉为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恢宏巨著，经过译者一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每当伏案工作之余，闭目遐想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位可敬的作家腋下夹着手稿，在寒风凛冽中，为这部书的出版四出奔波，行色匆匆的身影……我深深地为他坎坷的一生，为他这部奇书的坎坷遭遇嗟叹，惋惜。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最炽、环境最为险恶的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战地记者。战后，他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成为苏联很有影响的、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部书于1949年由著名作家茅盾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此后，格罗斯曼又写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书中有的内容触犯时忌，1953年遭到围攻批判，但格罗斯曼并未因此消沉。

1960年，格罗斯曼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写成《生活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书稿送到《旗》杂志编辑部后，立刻被视为洪水猛兽。据说，他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祸从天降，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也被席卷而去。作者为了此书的出版，还曾上书当时

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情词恳切，要求还他这本书以“自由”。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又召见他，明确指出，这部作品也许二百年后才能出版。作家受此精神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至80年代初，有人将书稿拍成缩微胶片，辗转带到国外，先后在瑞士、美国出版，从此在西方声名大噪。1988年，随着苏联国内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格罗斯曼这部小说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式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出版。此书目前在苏联国内的开禁作品和反思文学中，是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之一。

格罗斯曼是一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他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命运，他在这部小说中，回顾历史上的悲剧，思索现实中的积弊，写战争的残酷，写德国集中营的屠戮，写苏联劳改营的血泪，写政治迫害的暴戾，写苏联社会中的个人迷信，思想禁锢和践踏民主与法制。他百感交集，痛定思痛，上下求索，抒尽了他胸中的块垒和积郁，完成了这部思索型的小说。苏联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曾说：“格罗斯曼在1960年就懂得了今天我们才懂的东西。”1959年，格罗斯曼在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写道：“书的命运最近就要和我分离了。它将独自实现自我。”不错，作家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他的这部遗著是永存的，《生活与命运》必将历久弥新，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传世之作。

是为序。

王福曾

1989年4月25日

1

空中雾气迷漫。汽车前灯照亮了公路边的高压线。

没有下雨，但黎明时分，土地是湿润的。每当禁止通行的信号灯闪烁的时候，潮湿的沥青路上就浮现出一个轮廓不鲜明的淡红色光点。远在几公里之外就能看到集中营的景象。电线，公路，铁路，密密麻麻，全都向那里伸去，这是充满了直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地、秋空、薄雾都被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分割开来。

远方响起沉闷而悠长的汽笛声。

公路靠近铁路，一队满载水泥的汽车有一段时间与一列望不到尽头的、长长的货车，几乎同速行驶。穿军服的汽车司机们对比肩而行的列车，对车上人们一张张苍白的面孔，全然视而不见。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围墙，那是一排排架在钢筋水泥柱上的铁丝网。一溜溜棚屋构成了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千篇一律的格式显示出这座巨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俄罗斯农舍何止千万，但你找不出，也不可能找出完全雷同的两座房子。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都不会是千篇一律的。两个人一幅模样，两丛野蔷薇一个形象，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生命只有在暴力肆虐，力图抹杀它的特色和个性的时候，才黯然失色。

头发苍白的司机以一只眼，漫不经心地看着一掠而过的水泥柱，探照灯在上面不停旋转的高大电线杆，和那一座座水泥塔楼。透过玻璃凸窗，看得见在旋转机枪边值勤的卫兵。司机向他的助手使了个眼色，机车发出警告信号。灯火通明的岗亭，在涂有黑白条纹横栏木边等候的一长串汽车，公牛一样圆睁红眼的信号灯，转瞬而过。

远远的听到迎面驶出列车的鸣笛声。司机对助手说：“楚克尔来了，我听得这车野蛮的笛声，这车卸货后直奔慕尼黑。”

这空列车吼叫着与开往集中营的列车迎头相望。四散的水汽嘶响着，两列车的车厢之间，有灰色的光束忽明忽暗闪动，突然间，这空间和这秋日的晨光又象破布败絮一样连缀起来，凑成了一幅和谐跃动的画面。

司机的助手掏出衣袋中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油污的面颊。司机也打手势要借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手激动地说：“唉，阿波菲尔同志，您信不信，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我们本来能赶回去吃午饭，不必耗到4点钟。好象在我们中心站不能进行消毒似的。”

没完没了谈消毒这件事，老头听腻了。

“给个长信号，”他说。“我们不走备用线，直接开到主卸货场去。”

2

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依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头一次认真使用自己的外语知识。战前，他在列宁格勒不常有机会和外国人攀谈。现在，他又记起了流亡伦敦和瑞士的那些年代，当时，在革命者中间，大家能用好

多种欧洲语言说话、争论和唱歌。

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尔迪告诉莫斯托夫斯科依，集中营里有56个民族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中苦受煎熬的几万名居民，他们的命运遭遇，他们的脸色和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同样擦着地皮走路，喝的都是用冬油菜和俄国囚犯称之为“鱼眼睛”的人造西谷米熬的大锅粥。

对于集中营的长官来说，人们赖以区别的标志，就是号码和缝在衣服上的各色布条：政治犯戴红布条，怠工犯戴黑布条，盗窃杀人犯戴绿布条。

人们彼此间语言不通，但维系着他们的，是共同的命运。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手稿鉴定家要同意大利农民和目不识丁的克罗地亚牧民并排睡在硬板床上，当年，早餐要向厨师点菜，胃口不好又足以使管家娘惶惶不安的人，现在要同靠吃腌鱼下饭的人一道，拖着木底鞋并肩去上工，而且也都饿得发慌，盼着挑桶送饭的早点来。

集中营里囚犯们的命运，现在相同，过去不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那对往日的追怀。有的思念意大利土路边的那座小花园，有的思念北海抑郁的涛声，有的思念博布鲁依斯克^①郊区领导干部住宅中的那种桔红色的纸灯罩。反正每个囚徒都有着美好的过去。大凡人在进集中营之前，受的磨难越多，那他扯的谎就越离奇。

这扯谎没有实际目的，无非是颂扬自由之可贵，说集中营以外的人不可能没有好日子过……

这种集中营在战前叫政治犯集中营。

^①苏联莫吉廖夫州的城市。——译者

纳粹党又造出了一种新型政治犯，即没有犯罪的罪犯。

许多犯人之所以进集中营，是因为在友人聚会中批评了希特勒政权，说了政治笑话。他们没有散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活动。他们的罪名是，他们可能干这种事。

在战争时期，把战俘关进政治犯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一个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击落的英国、美国飞行员，有盖世太保感兴趣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要他们提供情报，答应合作，出谋献计；而且要让他们在形形色色宣言上签字画押。

集中营里还关押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怠工者，因为他们胆敢妄想擅自脱离开兵工厂和军事工程。集中营里关押不好好干活的工人，这又是纳粹党的一大发明。

集中营还有一些衣服上缝有紫布条的犯人。这是一些逃离法西斯德国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一大发明。凡是离开德国者，不管他们在国外如何检点自身，仍是政治上的敌人。

上衣戴有绿布条的犯人则是一些溜门撬锁的惯偷，他们是集中营里的特殊阶层，这里的看管人员靠他们监管政治犯。

从刑事犯统治政治犯这点看，这又是纳粹党的一个创新。

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经历过特殊遭遇的人，无法用布条的颜色来相应加以标志。但是，纳粹党仍然在这里为弄蛇的印度人，由德黑兰前来学习德国油画的伊朗人，以及攻读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准备了硬板床、喝烂菜汤的饭盒和在种植园的12小时劳役。

不分白天黑夜，列车源源不断向集中营，向这死亡之营开来。空中，充满了车轮的轧轧声，机车的吼叫声，还有那成千上万囚犯的脚步声。人人衣服上都缝着五位数的蓝色号码。集中营成了所谓新欧洲的城市。这些城市按照规划正日趋扩大，那里面有街巷、广场、医院，还有旧货市场、焚尸炉和运动

场。

一些城市边缘上的旧式监狱，和这些集中营相比，和这些焚尸炉上空足以把人吓昏的黑红色烟云相比，真未免是小巫见大巫，看来太憨厚、太迂腐了。

有人会以为，统治如此众多的囚犯，恐怕需要数量庞大的，乃至上百万的狱监和狱卒。但并非如此。集中营的棚屋里，有时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党卫军的人影！在集中营式的城堡里，囚犯们自己充任警卫的角色。他们自己维持棚屋的内部秩序，懂得自己只能往自己盆里放霉烂、冻坏的土豆，而把精选出上好的、大个儿的上豆送到军队的给养基地去。

囚犯是这劳工营医院和试验室里的医生和细菌化学家，是这劳工营内扫街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是这里的工程师，专司水电采暖、制造机器零件之职。

集中营里充任凶恶而干练的警察角色的是左臂上戴着宽宽的黄袖章的囚犯头，有营头、区头和室头，他们控制着集中营内上上下的生活，大至关系到全营的事务，小到夜里板床间发生的口角纠纷，他们无所不管。这种囚犯参与集中营王国之内的机要大事，甚至能参与圈定黑名单，参与水泥暗室内的刑讯拷问。好象只要上司不在，为了防止逃跑和监督干活，这些人就会自动维持高压电流的畅通似的。

这些囚犯头对集中营长官唯命是从，但他们也唉声叹气，看到有人送往焚尸炉的时候，也唏嘘流泪……不过，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不会持续到底的，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黑名单。最让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感到惶然的，是纳粹党徒在集中营里的形象，他们并不象演员表演的那样，戴着单眼镜，目空一切，不近人情。集中营里的纳粹党徒自有其特点，他们平易近人，并不脱离治下的顺民，他们象大家那样说笑，也能

逗引别人开怀大笑，他们是平民，而且随分从俗，他们对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对这些人的语言、内心和才智，了如指掌。

3

莫斯托夫斯科依，阿格里皮娜·彼得罗芙娜是8月的一天夜里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德国人逮捕的，之后，被解到了步兵师司令部。

经过审问，阿格里皮娜·彼得罗芙娜获释，译员按照野战宪兵队部的吩咐，给她一块豌豆面包和两张红色票面的30卢布钞票。谢苗诺夫被编进俘虏队，到韦尔加奇村的集中营司令部去了。莫斯托夫斯科依，索菲娅·奥西波芙娜·列维顿则被送到了集团军司令部。

在那儿，莫斯托夫斯科依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芙娜。她站在满是尘土的院子中，没戴船形帽，符号也撕坏了。让莫斯托夫斯科依感到欣慰的是她眼中和脸上流露出忧闷而忿怒的表情。

经过第三次审讯，莫斯托夫斯科依在驱赶之下徒步走到火车站。这里正往列车上装粮食。有10节车厢载着到德国当劳作的青年男女，列车启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依听到了女人的哭叫声。他被锁在硬座车厢的一间乘员室里。押解他的士兵倒不粗野，但当莫斯托夫斯科依问他话时，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聋哑人才有的表情。令人感到，这个兵确实在全神贯注看着着他。正如同动物园里有经验的饲养员在铁路的长途运送中，毫不懈怠，沉默无语，紧张注视着笼中低声嘶叫，来回走动的野兽一样。当列车经过波兰总督领地的时候，包厢里来了一位新旅客，此人是波兰主教，花白头发，颀长而俊秀，眼里流露出

悲戚，嘴唇象青年人一样丰厚。他马上就向莫斯托夫斯科依说起希特勒迫害波兰教会的情形。他的俄语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后来，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大骂了一通天主教和神父，他沉默了，待莫斯托夫斯科依再提问题，他也只是三言两语用波兰话回答。过了几个小时，到波兹南，让他下了车。

车过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依被押进集中营……来到这间盖世太保羁押要犯的监房，在这儿真是度日如年。这个特殊监房，略比劳工营吃得好些，但这是畜生遭受试验室磨难的一种轻松生活。有个值班的囚犯把一个家伙叫到门边，原来是他要占那人便宜，用一小撮烟换他一份吃的，这人倒也心满意足，嘿嘿笑着回到自己床上。接着又叫另一个人，这人中断谈话，向门走去，于是，这人的谈友悻悻而回。过了一天，囚犯头来到床边，吩咐值班的那个家伙收拾他自己的破烂搬走，随后就有人试探着问囚室头凯泽：能不能去占空下的床铺？就这样，百无聊赖，胡扯乱弹，打发日子，谈黑名单，谈焚尸，谈集中营里的几个足球队，说种植园的那帮沼泽劳工队最强，林区队也不示弱，伙夫队攻球凶猛，波兰人的“普拉采菲克斯”队缺少好后卫。一传十，十传百，花样翻新，关于新武器，关于纳粹领袖内哄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永远是诱人的，也是虚构的，这是集中营囚犯的一剂鸦片。

4

天将亮时，下了一场雪，这雪直到中午也没有融化。俄罗斯的囚徒们亦喜亦忧，雪带来了俄国气息，这白雪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铺上了母亲的头巾，这白雪染白了棚屋的屋顶，远看就象家乡的农舍一样。

但这转瞬即逝的喜悦立即蒙上了忧愁的阴影，继而浸沉于悲伤之中。

值日的西班牙士兵安德列亚走近莫斯托夫斯科依，用蹩脚的法语说，他当书记员的朋友看到了一页涉及你这个俄国老头的文件，可书记员没看完，办公室的长官就夺走了。

“看来我的生命就由这张纸决定了，”莫斯托夫斯科依想，转而又为自己的平静欣慰。

“不过不要紧，”安德列亚低声说，“还可以再去打听。”

“问集中营长官吗？”加尔迪问，他的一双大眼睛在半暗中闪光。“要么去问安全总局代表利斯？”

使莫斯托夫斯科依惊奇的，是加尔迪白天和黑夜判若两人。白天，这位神父谈菜汤，谈新来的囚犯，和邻床的人讨价还价，商量着交换口粮，思念蒜味浓烈的意大利式的饭菜。

红军战俘们在集中营广场上碰见他，都知道他的一句口头禅：“图蒂，卡普蒂，”打老远就向他喊：“帕德列老爹，图蒂，卡普蒂，”大家笑着，就象这话能给人带来希望似的。他们都叫他帕德列老爹，心想帕德列就是他的名字。

有一天晚上，关在特殊监房的苏军指挥官和政委们拿加尔迪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遵守终生不娶的誓言。

加尔迪脸无笑意，听着这些法语、德语、俄语乱七八糟，混合在一起的话。

然后，他开腔说话，莫斯托夫斯科依为他翻译。既然俄国革命者能为了理想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他的这些谈友就不相信，一个人为了宗教理想就可能不亲近女人呢？要知道，这和为理想而捐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好了，到此为止吧，”旅级政委说。

夜里，当囚犯们已经入睡的时候，加尔迪突然成了另一个

人。他双膝跪在床边，默默祈祷。好象在他怒火燃烧的眼中，在他丝绒一般闪亮的目光中，容纳了囚徒之城的全部苦难。就象在干活一样，他褐色的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的冷漠无情的长脸流露出悲戚、幸福而固执的表情。他久久地祈祷着，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在这个意大利神父的含混、匆促的低语中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依经常睡个把小时就醒来。此时，加尔迪已入梦乡。这意大利人睡得很深沉，似乎在梦境中把白天和黑夜中的两幅面貌溶合在一起了，他打鼾，嘴唇津津有味地翕动，咬牙，放响屁有如闷雷，突然间，以悠长的腔调念出一些圣父和圣母惠施仁慈之类动听的祈祷文来。

他从来不对这位俄国老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思想妄加针砭，倒是常常问及苏维埃俄国的事情。

这意大利人一边听莫斯托夫斯科依说，一边频频点头，似乎对关闭教堂和修道院，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地产这样的事，还表现出几分赞许的神情。

他的带着悲戚之色的黑眼睛，望着这位老共产党人。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强忍怒气，问：“Vous me comprenez?”^①

加尔迪微微笑着，这是他谈红焖牛肉、番茄汁一类人间俗务时常常流露出的笑意。

“Je comprends tout ce que vous dites, je me comprends pas seulement, pourquoi voui ditiez cela.”^②

关押在特殊监房的俄国战俘也要参加劳动，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依只能在晚上和夜间同他们见面和闲谈。古济将军和奥西波夫旅级政委不去劳动。

①您懂我的话吗？（法语）

②您说的我都懂，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说这些。（法语）

常找莫斯托夫斯科依攀谈的，是一个说不清有多大岁数的怪人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全棚屋中最倒霉的地点，紧挨着门口，穿堂风寒气逼人，有一段时间，这里还放着一个盖子乱发响声的长把马桶。

俄国囚犯们都管伊孔尼科夫叫“老伞兵。”见他古怪，对他半嫌恶，半怜悯。此人有着疯癫和白痴一般的惊人耐性。他从没感冒过，即便身上被秋雨打得湿透，他照样和衣而卧。他说话声音响亮、清脆，令人觉得只有疯子才会有这样的嗓音。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依是这样认识的。伊孔尼科夫—莫尔日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依跟前，默默审视对方的脸良久。

“有什么好事可说的，老兄？”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问，当伊孔尼科夫拖着腔调说出以下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笑了：

“说好事，行善事？什么叫善？”

这话突然间使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想起了童年时代，有一次哥哥放学回家同父亲争论神学课的情形。

“这是个老掉牙的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依说，“佛教徒和早期基督教徒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下过不少功夫。”

“可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问，他那腔调逗得莫斯托夫斯科依不由得哈哈大笑。

“瞧，红军，”莫斯托夫斯科依说，“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从您这腔调看，请原谅，有橄榄油的气味，象神父，或者象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腔调。”

“一点不错，”伊孔尼科夫说，“我就曾经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说。这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您看，”伊孔尼科夫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迫害教会，对宣扬基督教教义反而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就已经陷于可怜的境地了。”

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善意地说：“您简直是一位诡辩家。瞧，我到晚年才有机会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孔尼科夫脸色阴郁地说。“对你们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们的手段是无情的。您在我身上不会看到奇迹，我也不是诡辩家。”

“是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依说，突然怒不可遏。“那么，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伊孔尼科夫摆成军人“立正”的姿势说，“请别笑话我！”他凄恻的声音中流露出绝望。“我不是到你这儿来开玩笑。去年9月15日，我目睹了2000个犹太妇女、孩子和老人惨遭屠杀。这一天，我明白了，上帝不会允许干这种事情的。我如梦初醒，本没有什么上帝。我在今天的黑暗中看到了你们的力量，这是敢同可怕的邪恶斗争的力量……”

“好吧，”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说，“我们谈谈。”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的种植园干活。那里有许多巨大的水泥管道，用以引河水和污秽的溪流浸漫低地。这个地段的工人，人称沼泽兵。往往是一些不会讨好集中营上司的人才派到这里来。

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五指细长，长着象小孩一样的指甲。他总是满身泥水下工回来，走近莫斯托夫斯科依的床前，问道：

“可以在您这儿坐坐吗？……”

他坐下，面带笑容，并不看对方，用手摸摸额头。他额头秀美，不大，前凸，白皙，同泥污的耳朵、黑褐色的脖子、指

甲破损的双手相比，白得截然分明。

在经历单纯的苏军战俘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难以理解而可疑的人。

伊孔尼科夫的先祖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是代代相传的神父，只是到伊孔尼科夫家族的最后一代才改弦易辙。伊孔尼科夫兄弟按照父亲的愿望，都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教育。

伊孔尼科夫曾就读于彼得堡工学院，但他笃信托尔斯泰主义，读到最后一年级时，中辍学业，到彼尔姆省北部当乡村小学教师。他在农村呆了8年，后来辗转到南方奥得萨，成了一艘货轮上的机轮工，还游历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也呆过。革命后，他回到俄国，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早年的理想。他相信，通过共产主义式的农业劳动，一定会出现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期间，他看到过列车上满载着携家带口，被扫地出门的富农，他看到过那些瘦骨嶙峋的人跌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他看到过那些门窗全部钉死、荒无人烟的“封闭”村庄。他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她衣衫破烂，脖颈青筋暴露，那一双勤劳的手是乌黑的。她饿红了眼，竟然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连押送兵都目不忍睹。

此时，他离开了公社，开始传教，祈祷上帝拯救沉沦者。最后的结局是身陷囹圄，原来，30年代的灾难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监狱的精神病院被强制治疗了一年后获释，到白俄罗斯他哥哥家栖身，经由这位植物学教授的帮助，被安排到技术图书馆工作。但是，悲惨的往事给他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

战争开始，德军占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又见到了战俘遭受的苦难，见到了白俄罗斯城乡犹太人的惨遭屠戮。他又变得如痴如狂，苦苦央求熟识的和陌生的人设法隐匿犹太人，他

自己也尽力搭救犹太妇孺。很快就有人告密，他总算幸得天助，没被绞死，来到了集中营。

这个衣衫褴褛、浑身污垢的“老伞兵”，脑子里一团混乱，他反复宣扬那一套超阶级的荒唐而可笑的道德规范。

“哪里有暴力，”伊孔尼科夫向莫斯托夫斯科依解释，“哪里就会苦难临头，鲜血流淌。我看到过农民的大灾大难，说集体化是为了普济众生。我就不信什么普济众生，我信的是善心。”

“照您的说法，为了普济众生，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我们也要心慈手软了。您这个心慈手软还是离我远点吧，”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答道。

“您去问问希特勒，”伊孔尼科夫说，“他会告诉您，建这个集中营就是为了普济众生。”

莫斯托夫斯科依觉得，在和伊孔尼科夫辩论的时候，他的逻辑推理，就象向水母挥刀乱舞一样，简直是盲目费力。

“世上的事情总超不过六世纪一个叙利亚基督徒说过的真理，”伊孔尼科夫接着反复说：“谴责罪过，但要饶恕罪人。”

棚屋里还有个俄国老头，叫切尔涅佐夫。他是个独眼龙。卫兵打碎了他的玻璃假眼球，他的苍白的脸上就古里古怪地现出了一个红红的空眼窝。他见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用手掌把裸露的空眼窝挡起来。

这是个1921年逃离苏维埃俄国的孟什维克。他在巴黎住了20年，是银行会计。他进集中营的罪名是，煽动银行职员消极抵制德国新任当局的指示。莫斯托夫斯科依一向尽量少和他接触。

显然，莫斯托夫斯科依的名望惊动了这位独眼龙。无论是西班牙人当兵的，挪威人文具店老板，还是比利时人律师，都倾心于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向他虚心求教。

有一次，在苏军战俘中颇有地位的叶尔绍夫少校来到莫斯托夫斯科依床边。少校略微倚着莫斯托夫斯科依，手搭在他的肩上，匆忙、热烈地说了起来。

莫斯托夫斯科依偶然回头，切尔涅佐夫正从很远的铺位上看着他们。莫斯托夫斯科依觉得，他那只好眼所流露出的痛苦之情，比那只坏眼的红色伤疤更可怕。

“是啊，老兄，够你受的，”莫斯托夫斯科依想，但他这不是幸灾乐祸。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理本应如此，叶尔绍夫是个不可须臾缺少的人物。“叶尔绍夫在哪？怎么没见到叶尔绍夫？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过……去问叶尔绍夫……”别的棚屋的囚犯常来看他，他的板床周围总是人来人往的。

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赠给叶尔绍夫一个美名：精神领袖。曾经有过精神领袖，有过上世纪60年代的精神领袖，有过80年代的精神领袖，有过民粹派，还有过米哈依洛夫斯基^①。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这个独眼人没人搭理，落寞孤寂，他在这集中营里显然是个悲剧性角色。

自从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第一次坐沙皇的监狱以来，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当时是另一世纪，19世纪。

现在，他每当忆起往事时就觉心中忿忿不平，当时党内的某些领导人并不器重他的实际工作才能。可他认为自己是强者，他每天都可见到，不仅古济将军、奥西波夫旅级政委前来

^①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 俄国文学评论家，政论家。他的著作颇有影响。——译者